

專題研究

# 鄧小平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Deng Xiao-Ping and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Reform of China

沈有忠 ( Shen Yu-Chung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博士班

## 摘要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不僅正式宣告毛澤東時代的結束，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同時也代表著新的時代的來臨，鄧小平時代的來臨。這是因為延續毛澤東路線、延續文化大革命路線的華國鋒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逐漸的失勢，而第三度復出的鄧小平則慢慢的掌握了政治權力。為了挽救文革後的殘破以及鞏固自己的領導，鄧小平提出包括政治、經濟等重大的改革藍圖。大抵上說來，經濟改革至今的確看見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政治改革的整個發展則是充滿曲折。對於中共政治改革的討論相當豐富，本文以鄧小平主導的政治改革為核心，比較與歸納相關的著作中如何闡述鄧小平和政治改革的關係，特別是描述政治改革過程中歷經幾次轉折，而鄧小平在這些轉折的過程中發揮了什麼樣的影響力。由於中國的政治改革受到鄧小平的影響相當深遠，本文也希望透過不同著作的比較，能夠對鄧小平在政改中的定位能夠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

關鍵字：政治改革、四個堅持、經濟改革、鄧小平

## 壹、前言：鄧小平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權力鞏固

1977年7月，第十屆三中全會決議讓鄧小平恢復1976年4月天安門廣場事件後失去的七個職務，包括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鄧小平也正式的再度復出。這個時候的鄧小平仍不足以威脅到身兼黨政軍三方首腦的華國鋒，但是已經開啟了鄧小平復出並且逐漸掌握中共政治權力的大門。同年中共十

一大的召開，在人事安排上呈現華國鋒集團和擁鄧派勢均力敵的局面，葉劍英成為平衡的力量，倒向哪一邊，哪一邊就能獲得較大的力量<sup>1</sup>。鄧小平復出後，沒有立即對華國鋒進行鬥爭與奪權，而是積極的在所管轄的工作上擴大影響，同時集結改革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華國鋒高舉「兩個凡是」的大旗，成為改革派攻擊的目標，而鄧小平抓準改革派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力量，也從「兩個凡是」開始進行對華國鋒的挑戰，1977年年底，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正式開啟鄧小平挑戰兩個凡是以及衝擊華國鋒勢力的大門。1978年5月，在胡耀邦策劃下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的說法，歷經了數個月的辯論鬥爭，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鬥倒了「兩個凡是」，也使得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權力鬥爭正式逆轉成鄧優華劣的局面，政治權力也開始由鄧小平掌握主動權。

鄧小平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年半從復出到掌握政治權力，幾篇著作有不同的詮釋。韓文甫認為鄧小平的成功有幾個原因<sup>2</sup>：

鄧小平集團看清改革時勢，順應潮流，而華國鋒集團抱殘守舊。

鄧小平與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元老利益一致，也能爭取這些勢力的支持。

鄧小平策略正確，步步為營，先在工作思想取得統一，迫使華國鋒集團對這個統一的思想自我反省。

鄧小平年輕力盛，不只在國內有一定聲望，在復職後陸續出訪也提高國際威望。

阮銘則認為鄧小平順利鬥倒華國鋒是因為國內、黨內的改革派已經凝聚，華國鋒抗拒改革，而鄧小平支持改革，使得鄧小平能夠獲得改革派的支持一舉鬥倒華國鋒<sup>3</sup>。而高泉則認為鄧小平一派以漸進方式逐漸削弱華國鋒實力，在經濟議題上抓緊華國鋒冒進的錯誤，讓社會出現「華國鋒沒有能力統管中國經濟」的印象，迫使華國鋒逐一讓步並退出權力核心<sup>4</sup>。陳永發認為鄧小平採用迂迴戰術對付華國鋒，在鄧小平復職之初並沒有立即而公開的向華國鋒提出挑戰，而是見機行事，伺機而動。從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上，鄧小平步步為營的拔除「小四人幫」<sup>5</sup>，並透過平反獲得社會廣大的支持。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平反了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人，並從此開始將審查幹部的權力集中在胡耀邦控制的中央組織部，華國鋒也

<sup>1</sup> 韓文甫，鄧小平傳（香港：東西文化出版，1994），頁 584-585。

<sup>2</sup> 同註 1，頁 605-606。

<sup>3</sup> 阮銘，鄧小平帝國（臺北：時報出版，1992），頁 71-72。

<sup>4</sup> 高泉，後文革史上卷：鄧小平東山再起（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頁 450-462。

<sup>5</sup> 小四人幫即指汪東興、吳德、紀登奎與陳錫聯等華國鋒的心腹。

開始潰退<sup>6</sup>。從以上對一些著作的檢閱可以發現，關於鄧小平順利鬥倒華國鋒的描述，一般說來是認為鄧小平是漸進的，逐步的布局，同時爭取老人幫如葉劍英、陳雲、李先念以及改革派如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支持，並從外圍製造輿論與拔除華國鋒的黨羽著手，終於在兩年內從復出到完全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共政治權力中心的第一人。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成為中共政治權力的第一人，隔年的8月、11月，華國鋒陸續辭掉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等黨政軍第一要職，分別由改革派的趙紫陽接任總理、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任中共軍委主席，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鬥倒了華國鋒的凡是派，鄧小平時代也正式開啟。

## 貳、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

鄧小平作為改革派的大將，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經被認定的。經過了文革的鬥爭，鄧小平重新復出並沒有放棄改革的理想，在順利取代華國鋒成為領導人之後，鄧小平的改革理想也順利的提出。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具有兩個層次的意義，第一是政治制度確實需要具體的改革才能解決中國從文革以來面臨的困難。第二是國際及國內的環境都已經醞釀改革的氣氛，鄧小平就是集結改革的力量才順利打倒華國鋒，如果一得到權力又停止改革，將失去改革派的支持。以下從這兩個觀點來討論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背景。

### 一、文革對政治體制的反省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造成的傷害難以估計，政治體制方面也造成嚴重的破壞。文革時期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就是法律，使得原本即已不完備的法律體系以及原本就具有重大缺陷的政治體系都遭受到摧毀而無法運作<sup>7</sup>。此外，文革結束時，大陸經濟滯後和人民生活貧困已是政權面前嚴峻的問題。鄧小平主導的改革方針迎合了民心，也迎合了歷史走向。此外，在清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時，人們醒悟到，執政的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政策性錯誤，並不是領袖的個人失誤，而是深藏著制度上的原因<sup>8</sup>。

### 二、改革派力量的凝聚

另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大陸在1977年出現罕見的改革契機，因為國內、國際、

<sup>6</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頁868-872。

<sup>7</sup> 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1），頁52。

<sup>8</sup> 同註4，頁367-368。

黨內三個層次都凝聚了改革的氣氛。國內條件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實現的黨內改革力量與社會民主運動的聯盟，結束了華國鋒以兩個凡是為標誌的毛澤東教條主義。國際條件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發展得到除了蘇聯及越南以外大多數東西國家的支持。黨內條件上則是從中央到地方凝聚了一股可觀的黨內改革力量。

從這兩個原因可以歸納出，鄧小平高舉改革的訴求，確實反應了當時的中國大陸在文革後具體所凸顯的制度問題，也同時能夠符合逐漸成長的改革派勢力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改革的呼聲，自然而然使鄧小平更加穩固打倒華國鋒後的政治領導權力。

### 參、改革的開始與停滯：西單民主牆與四個堅持

鄧小平的政治改革藍圖還沒具體提出，改革的空氣已經瀰漫整個北京，「北京之春」<sup>9</sup>的氣息充斥在北京的街頭，讓改革派一度以為民主的實施契機就要來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西單民主牆人民民主運動實現黨內改革力量與人民民主運動的聯盟，也擴大與鞏固了鄧小平的權力基礎<sup>10</sup>。鄧小平針對公開批評毛澤東的大字報問題向日本社會黨委員佐佐木良表示「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形勢穩定的表現。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sup>11</sup>這種大字報文化後來集中在北京市西單的一面牆上，就是著名的西單民主牆。

西單民主牆提供鄧小平改革的社會基礎，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波社會力量。然而，隨著「中越之戰」的開啟，西單民主牆將批判的火力對準鄧小平，認為這場戰爭讓鄧小平有變成新獨裁的危險。因此，這股力量沒有多久就遭到反對改革的聲音甚至鄧小平本人的壓制，成為改革中的第一次停滯。鄧小平個人的性格無法接受西單民主牆對他的質疑與挑戰，尤其是抨擊中越戰爭。因此，在胡喬木、鄧力群等反改革派的醞釀下，鄧小平於 1979 年 3 月 30 日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sup>12</sup>。「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也成為鄧小平建立專制的政治綱領，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倒退<sup>13</sup>。

此外，下鄉知識青年的示威，西單民主牆直接對鄧小平的攻擊，都讓鄧小平感

<sup>9</sup> 「北京之春」是指 1978 年年底至 1979 年年初，北京、上海等城市掀起的群眾民主運動。

<sup>10</sup> 同註 3，頁 47。

<sup>11</sup> 請見人民日報，1978 年 11 月 28 日。

<sup>12</sup> 這四項基本原則分別是：一、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三、堅持共產黨領導；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sup>13</sup> 同註 3，頁 60-63。

覺到必須對這股勢力有所壓制。因此，鄧小平改變寬容為壓制，頒布了「公安六條」，逮捕了傅月華、魏京生等人<sup>14</sup>，將民主的氣息一掃而空。隨後提出的四個堅持，也成為中共新的權威。鄧小平最初容忍「北京之春」的原因在於藉此打壓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藉由輿論來壓制華國鋒的勢力。但隨著民主運動的日益擴大，在鄧小平的聲望如日中天之際，民主力量對鄧小平的挑戰也讓鄧小平本人感受到超出可以容忍的範圍，因此開始了對魏京生等人的逮捕以及「四個堅持」的發表，具體管制民主運動的發展以穩定鄧小平領導的政治局勢<sup>15</sup>。

民主運動的改革浪潮對鄧小平而言是具有「工具性」的階段效益。在與華國鋒對抗的軌跡上，鄧小平選擇與社會的民主勢力結盟，採取對西單民主力量的容忍與接納作為反制華國鋒的手段，但是一旦這股力量迅速成長膨脹，甚至瀕臨對鄧小平地位的威脅時，鄧小平便立即轉變態度，從容忍接納變成無情的壓制。而四個堅持的提出則成為此後改革之路上無法超越的底線與框架。

#### 肆、庚申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談話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談話，這個談話後來在廖蓋隆的說明、引申和發揮之下，成為中共政治改革的「庚申方案」。在這個談話中鄧小平對政治改革提出了以下幾個重點<sup>16</sup>：

總理不再由黨主席兼任，原因在於： 權力不宜過分集中； 兼職副職不宜過多； 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

改革的必要性和目的：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的發展。實現： 經濟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政治創造比資本主義更切實的民主； 為國家造就更多優秀人才。

當前存在的問題：官僚主義、權力過於集中、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終身制、各種特權現象。

重大的改革措施： 修改憲法； 增設顧問委員會； 建立從國務院到地方政府的工作系統，不再由黨中央、地方黨委做決定； 企業單位設立職工代表大會； 各級黨委落實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

<sup>14</sup> 傅月華為帶領上訪群眾上街示威的女青年，魏京生則是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以及抨擊鄧小平為「新獨裁」的「探索」雜誌主編。

<sup>15</sup> 同註6，頁886-887。

<sup>16</sup> 關於談話內容請參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香港：三聯書店，1983），頁280-302。

鄧小平所發表的談話，成為中共此後關於政治改革的一項重大指標與藍圖，日後許多與政治改革相關的談話與發展，幾乎都與這次的談話有關。這個談話也被視為是鄧小平改革思想的「光輝頂點」，因為：

鄧小平認識到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於政治制度問題，如果不改變制度，過去的嚴重問題有可能再度出現。

鄧小平分析了中國大陸黨和國家制度中的弊端，如官僚主義、權力集中、家長制、職務終身制、特權制等等。

鄧小平具體提出了改革的目標，保證國家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民主化，希望創造比資本主義更切實際的民主制度。

鄧小平從制度上否定領導人自己選擇接班人的作法<sup>17</sup>。

廖蓋隆詮釋鄧小平改革思想所提出的「庚申改革」，其原則與設想在當時都相當超前。中國大陸依照這個方案一步步走下去，民主的希望可能就會實現。但改革首先觸動的就是既得利益者，而共產黨就是一種官僚特權的體制，若不從思想上根本轉變，真正的改革也只是紙上談兵<sup>18</sup>。至於中共方面的學者則是認為庚申改革具體的提出對中共政治改革的藍圖，因為鄧小平的談話內容具體的包括了：闡明制度為根本問題；具體制度（現行制度）和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區隔開；指出權力過份集中的弊端；論證改革關鍵在於「黨政職能分開」；指明改革是保證實現民主<sup>19</sup>。

「庚申改革」的提出，對於中共的政治改革而言是提出了對既存體制具體的批判以及改革的具體方向。鄧小平的談話顯示他對政治改革的確具有一套藍圖與理想。但隨著政治權力的持續鬥爭以及受限於鄧小平自己先前所提的「四個堅持」之下，這個具體的改革方案並沒有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帶來新氣象。在此同時，鄧小平這次關於體制改革的談話也代表著由鄧小平主導的改革時代正式起步。

在鄧小平提出政改藍圖之後，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過了黨章的修訂，11月的五屆人大也通過了新的憲法<sup>20</sup>，表面上政治改革確實已經具體啟動，但是觀察修改後的內容可以發現新的憲法和黨章仍未跳脫「以黨專政」的窠臼，新憲法序言即強調「四個堅持」為國家方針的至高原則。此外黨仍是權力核心，憲法規定「國家

<sup>17</sup> 同註3，頁99-100。

<sup>18</sup> 同註4，頁417。

<sup>19</sup> 陳瑞生、龐元正、朱滿良，中國改革全書—政治改革卷（大連：大連出版社，1991），頁18-19。

<sup>20</sup> 新憲法內容包括了：恢復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增設軍事委員會，以上均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體現黨政分開的要求。恢復加強國家權力機構與行政機構，根據新組織和選舉法，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長及司法機關均由地方人大選舉產生。新憲法對國家領導職務做了任期限制，避免終身領導。十二大則確立了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新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

主席」與「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由「人代會」選舉產生，等於由黨決定<sup>21</sup>。

## 伍、改革的轉折與分裂：胡耀邦遭到罷黜

直到 1986 年以前，鄧小平領導的經濟改革是見到成效的。而政治改革卻始終沒有太大的進展，這是因為鄧小平「四個堅持」的限制，使政治改革難有根本性的突破。到了 1986 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出現牛步的現象，一般輿論再度營造出要進一步推動經改，必須進行政治改革，而要求政改的聲音也普遍蔓延開來。鄧小平本人在 1986 年 6 月聽取經濟情況匯報時表示：「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順應時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種標誌。……」<sup>22</sup>同年的 9 月 3 日號鄧小平再度表示：「對於改革……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能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所以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sup>23</sup>在這個情況下中共的政治改革重新在 1986 年被提出來。

關於政治改革重新在 1986 年被提出，是鄧小平順應改革時勢所致。改革仍舊侷限在黨的領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之上。並且把政治體制改革當作保障經濟改革成果、使之繼續前進的一種手段。鄧小平不談民主化的根本目標，只縮小在黨和政府的具體問題，並且強調「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sup>24</sup>。也因為如此，鄧小平重提政治改革時，將制度換為「體制」，為了與經濟體制相協調，滿足經濟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改革也凸顯了其侷限性與急迫性<sup>25</sup>。1986 年將政改重新提上議程，根本上卻否定了胡耀邦的改革主張，該年的北戴河會議訂出三項基調：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討論，具體部署要緩；繼續遵守四個堅持；在現行制度上作調整，以適應經濟改革為主<sup>26</sup>。這次重新提出的政治改革並沒有具體的方針與藍圖，但是卻引來一連串的政治風暴，並且醞釀了黨內保守派要拉下胡耀邦的氣氛。

1986 年的中國大陸，因為經濟改革的遲滯加上鄧小平重新提出的政治改革言論，使學生再度活躍起來。對現況不滿的學生組織起來走上街頭，透過對物價、特

<sup>21</sup> 龍飛，「從中共黨政結構看其政治體制改革」，匪情研究（第 29 卷第 10 期，1986），頁 29-39。

<sup>22</sup> 詳細的講話文稿內容請見鄧小平，「在聽取經濟情況匯報時的談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香港：中華商務出版，1987），頁 118-120。

<sup>23</sup> 詳細的談話內容請見鄧小平，「不改革政治體制會阻礙生產力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香港：中華商務出版，1987），頁 124-125。

<sup>24</sup> 同註 3，頁 179-180。

<sup>25</sup> 同註 4，頁 71-72。

<sup>26</sup> 同註 21，頁 33。

權的問題要求改革的加速與深化。當時的學生運動仍舊支持鄧小平，希望在鄧小平領導之下繼續改革，尤其是開始政治改革。面對學運的興起以及越來越激烈的抗爭，共產黨內部對於如何處理這一連串的學運出現分歧的聲音。主政的胡耀邦採取疏導的懷柔政策，並且以繼續改革來讓學生支持共產黨的領導。胡耀邦提出的改革內容中，最敏感也是引起後來黨內風暴的一項就是針對老幹部的退休一事。退休問題讓胡耀邦得罪了黨內的權力既得者，尤其是資深的老共產黨員，當然包括鄧小平本人。一連串的學運加上胡耀邦的壓力，黨內的老共產黨員連袂拜訪鄧小平，把學運歸咎在胡耀邦身上，要求罷黜胡耀邦<sup>27</sup>。

十二屆六中全會後，鄧小平針對退休之事詢問胡耀邦的意見，表示自己要全下，並要胡耀邦、趙紫陽半下，帶動一批老人退休，以利幹部年輕化。胡耀邦當場表示贊成，沒想到觸動了鄧小平對權力最敏感的地方。面對學運的日漸擴大，鄧小平終於表態，在1987年元旦公開表示「一些同志表現軟弱，不敢理直氣壯起來鬥爭，這個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並且下令公安部開始進入天安門廣場抓人，這個局勢迫使胡耀邦遞出辭呈。

胡耀邦的辭職也象徵這一次的政治改革提出草草結束，還沒有開始改革，甚至連改革內容都還沒有提出就在鄧小平的反覆之下告終。鄧小平罷黜胡耀邦同時有局勢的壓迫以及鄧小平自己對胡耀邦的不信任所致<sup>28</sup>。以當時鄧小平與趙紫陽的實力，如果兩人任一方不支持罷黜胡耀邦，這個結果就不會出現，因此是在鄧小平所主導的「宮廷政變」下讓趙紫陽接胡耀邦的位子，同時穩固自己的領導以及在可控制的範圍內進行改革<sup>29</sup>。鄧小平感受到胡耀邦的壓力是有跡可尋的，1986年老幹部橋牌賽胡耀邦贏過鄧小平，這個插曲讓鄧小平驚覺胡耀邦在政治權力上凌駕自己的壓力，於是順著強硬派的要求把胡耀邦罷黜<sup>30</sup>。

至此，對於這次政治改革的提出到胡耀邦的下台，一般皆認為是因為經濟改革的遲緩，加上社會的要求而迫使鄧小平將政治改革重新提出。但是在胡耀邦的設計下，政治改革的具體內容是領導幹部的汰舊換新，也就是要求鄧小平為首的一些老幹部退休，離開權力核心，這個措施讓鄧小平以及其他大老震怒，於是藉由學運以及黨內強硬派的要求，將胡耀邦罷黜下來，以再次穩固鄧小平以及諸大老的領導地位。這次的轉折與分裂，同時也成為日後更大規模學運甚至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遠因。

<sup>27</sup> 這些老共產黨員包括彭真、王震、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余秋里、楊尚昆等人。

<sup>28</sup> 同註1，頁714-715。

<sup>29</sup> 同註3，頁201-202。

<sup>30</sup> 同註4，頁325。



## 陸、重回改革之路：十三大的政改藍圖

罷黜胡耀邦之後的中共政治並沒有因此而平息下來，而中共的政治改革則是顯得平淡。鄧小平在罷黜胡耀邦以及管制 1986 年的學運之後，與民主力量再次決裂，在鄧小平的左邊是陳雲、王震等保守教條勢力，在他的右邊則是取代胡耀邦的趙紫陽，訴求政治專制而經濟改革的半改革派<sup>31</sup>。雖然如此，鄧小平基於希望經濟改革持續的前進，仍舊提出對政治改革的訴求，只是經過胡耀邦的事件之後，鄧小平對政治改革已經大幅縮小在於行政革新與效率革新之上，並沒有打算根本的處理政治制度的問題。在十三大召開之前，中共在趙紫陽領導下成立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由鮑彤擔任辦公室主任，具體研擬政治改革的方針。而提出的改革方向與主持者包括了<sup>32</sup>：

黨政分開：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負責。

黨的組織與黨內民主：由周杰負責。

權力下放：賀光輝負責。

人事改革：中共中央組織副部長曹志負責。

社會主義民主：胡繩負責。

社會主義法制：中央法制委員會副秘書長余孟孝負責。

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原則：廖蓋隆負責。

1987 年 7 月，政改辦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針對權力集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以黨治國的問題提出討論，關於這個設想鄧小平表示「完全贊成」。這個設想也因此 10 月份的十三大具體提出，包括七個要點，分別是實行黨政分開與加強黨的制度建設；進一步落實權力下放；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強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sup>33</sup>。

對於十三大的改革藍圖，多數的論點是持保留態度的。主要的原因在於鄧小平罷黜胡耀邦之後，對於政治權力只有更加小心的收攏而沒有開放之意。十三大推動的是行政改革，不是制度上的改弦易轍，而十三大的結果是使鄧小平的領導更鞏固，大搞有別於毛澤東的「低調的個人迷信」。此外，十三大的改革藍圖在鄧小平主持之下充其量都是為了配合經濟改革所致，而這個改革方案受到中共意識形態和元老權

<sup>31</sup> 同註 3，頁 229。

<sup>32</sup> 這七個方向分別成立專門小組，而成員也分別為學者和實際工作者參與，請參考高皋，後文革史下卷：趙紫陽回天乏術（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頁 80-81。

<sup>33</sup> 廖蓋隆、莊浦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 601。

力的束縛，與「庚申方案」相較之下更是一種退步<sup>34</sup>。十三大召開前後，鄧小平為了穩固自己的領導權力，爭取老人的支持，一方面讓趙紫陽著手政治體制的行政革新，以利經濟改革的持續發展，一方面卻也在北戴河會議上做出反自由化的決議，並且「勸退」了吳祖光、王若水；撤銷了蘇紹智黨內外的職務；開除了張顯揚的黨籍<sup>35</sup>。

從鄧小平左右反覆的改革策略來看，十三大的政改藍圖對鄧小平而言是工具性高於實質的改革理念的。鄧小平透過政治改革只開放行政革新與增加效率的部分，來獲得改革派以及社會群眾的繼續支持，並希望透過行政革新與增加效率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另外一方面，鄧小平卻也透過對自由派的壓制，透過反自由派以及拉攏老人的政治支持來獲得黨內一致的團結景象，鞏固了領導的地位。因此，十三大的召開對鄧小平而言，真正的重點不在於改革理念的繼續推動，而是在罷黜胡耀邦之後重新鞏固了自己的領導權威。

## 柒、改革的終止：六四天安門事件

十三大之後，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更加鞏固，但是對於政治改革充滿希望而又再度失望的社會，由學生階層開始反應出來。這股對現況不滿、對改革不滿的聲音，因為胡耀邦的驟逝而加速出現，並且越演越烈，成為危及包括鄧小平在內所有領導班子權力穩固的力量，也迫使鄧小平、李鵬等最終採取武力鎮壓的手段，壓制了社會的運動，也終止了政治改革的繼續推動。

十三大之後，經濟改革並不如預期順利，價格改革帶來的通貨膨脹和倒買倒賣衝擊了趙紫陽的領導地位。1988年9月，中共的十三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收縮經濟的決定，並且迫使趙紫陽讓出經濟改革的權力，由李鵬、姚依林等保守派接手。這個轉變使得改革的路線面臨停頓，在經濟危機衝擊之下，1989年4月胡耀邦驟逝，醞釀許久的民運瞬間爆發開來，從單純的追悼胡耀邦一直演變到對改革開放的要求，這股力量從知識分子開始，齊聚在天安門廣場要求政治改革與民主自由的聲音越來越宏亮。在情況越來越失控的發展下，鄧小平終於決定選擇與李鵬、彭真、楊尚昆等保守派結盟，做出了「開槍鎮壓」的決定，同時軟禁趙紫陽，使得改革一夕之間全部喊停，才準備到位的政治改革，雖然只是行政革新、效率革新的內容也全部終止。

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上做出鎮壓的決定使得改革路線終止，是早可預見的，在

<sup>34</sup> 同註33，頁82。

<sup>35</sup> 同註1，頁724。

鄧小平一次又一次的反覆過程中，已經先後與社會民主運動（西單民主牆）決裂、與黨內民主派（罷黜胡耀邦）決裂、甚至在最後也與新威權主義的經改派（軟禁趙紫陽）決裂，所以在最後關頭只能選擇與老極權主義者結盟，與槍桿子主義結盟，對民主的鎮壓是無法避免<sup>36</sup>。加上鄧小平對於自己所提出的四個堅持相當堅決，其中以堅持共產黨專政為最高的指導原則，黨內面對學運所出現的分歧態度，本來鄧小平都可以容忍趙紫陽的同情態度，直到李鵬、姚依林提出再不採取非常手段，將使共產黨亡黨的警告後，才同意鎮壓，並且收回所有權力<sup>37</sup>。鄧小平一向追求權力穩定，面對學運，一開始是讓趙紫陽去安撫與處理的，等到趙紫陽無法收拾越演越烈的民運時，鄧小平基於對穩定與權力維持的要求，才轉而支持李鵬等人的強硬主張，決定對人民開槍。這種鎮壓的最終決定，似乎也是無法避免的宿命，因為鄧小平自從4月份做出將民運視為反革命動亂的判斷以來，一直沒有改變策略，在一片「打倒鄧小平」的聲浪之中，作為一個老人只會更加惱怒，因此，用強硬手段終結學運，也必定是中共決策人物保護自己的最佳選擇。

對於鄧小平究竟是主動還是被迫選擇鎮壓來終結這次民運有不同解釋，但是相同的是，鄧小平基於對穩定與權力鞏固的渴望，使他最後做出了鎮壓而不是退休的決定。這一次的鎮壓，不只鎮壓了民運，也鎮壓了十年的改革開放路線，不只終結了民運，也終結了中共的政治改革。

鄧小平在下令武力鎮壓民運人士與學生之後，6月9日公開出面發表講話，重點有三：強調與老同志一同承擔下令鎮壓的責任；將八九民運定位為反共產黨及反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運動；堅持十三大的決議路線<sup>38</sup>。這樣的宣示雖然表示鄧小平仍舊願意支持改革，但是很明確的已經宣告改革無法突破早年他所講的四個堅持，而改革更必須在他本人權力穩固之下才能繼續進行。在這之後，鄧小平已經罷黜改革派中的胡耀邦與趙紫陽，他自己的改革班底已經毀在自己手上，鄧小平也意識到必須再度尋找權力繼承人，以免再走回頭路，甚至將已經完成的改革全部推翻。新的繼承人必須能夠得到老人的支持，又不能夠是下令開槍的保守派分子，江澤民就是在這兩個條件下脫穎而出，成為新的領導核心<sup>39</sup>，而鄧小平經過八九民運的衝擊後，也在1989年11月的五中全會上宣布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正式將權力交接給江澤民。只是，在這個時間點上，所有人都相信，真正的領導人仍然是鄧小平。而這個時候中共的發展策略則是經濟上繼續改革，政治上鞏固領導。

<sup>36</sup> 同註3，頁253。

<sup>37</sup> 同註6，頁915-922。

<sup>38</sup> 同註1，頁822。

<sup>39</sup> 江澤民在當時是李先念、陳雲所推薦的人，而且對民眾而言也是一個「新人」，可以具有繼續改革的形象。

後鄧時代的中共政治改革，已經變成一場「行政革新」，關於制度與權力的根本問題沒有再被提出甚至討論，名義上的政治改革充其量是集中在提昇效率、落實法制等方面。1992至1997年的政治改革表現在適應市場經濟改革、國家公務員制度推行、有關國家權力結構體系的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淡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等四個方面<sup>40</sup>。政治改革走到這裡，仍舊脫離不了鄧小平所提出的「四個堅持」的窠臼。

## 捌、結論：鄧小平與搖擺不定的政治改革

檢視「六、四」之後的中共政治結構，雖然鄧小平表面上將權力完全交出，但作為改革的總設計師，曾經鬥垮華國鋒、親自罷黜胡耀邦、軟禁趙紫陽甚至下令對人民開槍的領導人，誰也不能小看退休後的鄧小平還具有多少的影響力。中共的政治改革走到這裡，一路上反反覆覆，經過六四事件得到證明，所有的改革都不能違背四個堅持中「堅持共產黨領導」這一條。

鄧小平從1977年的第三度復出，到1989年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這段時間，他在搖擺不定的政治改革中確實具有許多爭議的地方，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政治改革的走向與發展完全受到鄧小平的影響。儘管中共的權力鬥爭在華國鋒下台之後仍舊沒有停止，但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在持續的鬥爭中仍舊進行著，只是鄧小平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並沒有始終如一的依照一套藍圖來前進，而是在過程中不斷的修正與調整，這也是他自己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表面上是走向河的另一端，而水面下卻是暗潮洶湧的激烈競爭。

中共千變萬變，不能改變其對馬、列、毛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共黨專政的信仰，不過鄧小平所謂的底線卻是在改變之中，除了堅持共產黨專政這一條以外<sup>41</sup>。鄧小平是一個隨著政治現實的需要而可以隨意變化的政治實用者，「四個堅持」的發表正是這個實用主義表現在鞏固自身權力下的產物。對於整個改革的侷限，是鄧小平本身思想的限制，雖然農業、經濟改革成功了，但在意識形態的限制下，鄧小平無法開放根本的政治改革，時放時收的改革過程中，凸顯鄧小平無法與馬、列、毛思想澈底劃清界限的限制<sup>42</sup>。中國的政治改革一路走來搖擺不定，除了受到鄧小平本人在現實政治之中的考量，將政治改革視為鞏固個人政治權力的工具外，整個過程是深受政治核心的權力鬥爭所影響的。

<sup>40</sup> 黃衛平，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縱橫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頁145。

<sup>41</sup> 同註6，頁957。

<sup>42</sup> 同註1，頁903-904。